



策·曼·女·性·文·化·书·系

中国妇女 向后转

解玺璋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妇女 向后转

□解玺璋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妇女向后转/解玺璋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5. 8

(莱曼女性文化书系)

ISBN 7-5063-0960-2

I. 中… I. 解… II. 妇女-生活-现状-中国 N. D44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4526 号

中国妇女向后转

作者:解玺璋

责任编辑:杨 葵 王 析

装帧设计:张 梅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有色曙光印刷厂印刷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092 1/32

字数:119 千字

印张:5

版次: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 7-5063-0960-2/I·951

定价:8.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GLAMOUR

莱·曼·女·性·文·化·书·系

颠簸窄路行

晚清文人妇女观

西方文化与现代中国妇女观

睁着眼睛的梦

宗教与女性

中原女子服饰史稿

中国妇女向后转

为自由辨明

镜城突围

女智者共谋

写在前面的话

妇女研究，作为一门真正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在西方也不过几十年的历史。它的产生、发展，与西方女权、人权运动有着深刻联系，且随着社会的变化，也不断变化着。当“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诸种思潮在西方学术舞台此起彼伏的时候，中国文化界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大多还停留在感性的直观上。与不断变化的中国妇女现状相比较，我们的学术追踪，显然是缓慢的。正是基于这一现状，我们的几位学人，在这里开始了一次有趣的跋涉。妇女研究，是一门很难独立的学科，它本身所覆盖的精神空间，差不多跨越了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这也恰恰使我们的当代学人，从另一个角度上，丰富了对东方文化自身的认识。东方人对妇女问题的现代意味的阐释，其参与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至少提供了一种西方人所少有的精神视角。

中国文化中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早在几千年前就大致形成模式，且对东方诸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妇女的命运来看东方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可做的探讨显然很多。晚清以来，许多文人已逐渐意识到妇女解放问题，到了“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呐喊，把女性解放问题提到了很高的文化层次上。如今翻看“五四”先驱者们的遗著，亦可听出那呐喊声音的纯净、真诚。直到今天，它对文化人的影响仍十分深远。

但“五四”时期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大多杂糅在“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等问题里，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只是近些年来，门户得以开放，留学人员增多，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渐成风尚。随着西方诸种思潮的影响加大，中国的妇女研究已提到了日程上来。近些年来我们在社会学、女性文学批评等领域出现的成就，说明妇女研究的条件已开始走向成熟。

本套丛书是东方文化人对东方妇女乃至世界妇女生存现状、文化现状的一次透视。东方人自然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以一种新式逻辑秩序向传统挑战——不管西方理论怎样变来变去，对东方人来说，世界的存在是可以通过知识的归纳与事实的顿悟而抵达本质世界的所在的——虽然它缺少所谓“体系”与“主义”，但这是几代东方人用生命所结成的智慧之果。人们在这些多彩的理性世界里，可以谛听到有关东方妇女的奇妙的声音。我们相信，本套丛书无论在史料还是理性的思考上，均会给人们带来一种新奇与愉悦。

这是一次美好的合作。我们的七位女作者和三位男作者，以各自特有的敏锐与智慧，探入各自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将他们真诚的生命足迹留在了这套丛书里。我们要感谢作家出

版社为这套丛书的顺利出版所做的诸多努力；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北京莱曼实业有限总公司的总经理杜文彬先生，他是一位非常有眼光的现代企业家，曾多次支持和赞助国内的文化事业，正是由于他的关心和鼎力相助，才促成了这套丛书的问世。

《莱曼女性文化书系》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这套丛书也将为 20 世纪中国妇女文化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王 绯 孙 郁

1995 年 7 月于北京

目 录

开放的中国还需要淑女吗？	(1)
1. 问题的提出	(1)
2. 男人说：淑女难寻	(9)
3. 女人说：重新拥有自己的身体	(18)
给女人一个说法	(29)
1. 女人是什么？	(29)
2.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人	(36)
3. 女性的觉醒：我是和你一样的人	(49)
4. 女性的困惑：选择的两难	(66)
5. 天生的女人和后生的女人	(81)
女权的边界	(89)
1. 女性的权利要求	(89)
2. 女权：可选择的与不可选择的	(111)
3. 男女平等：现实与神话	(125)
女性的迷失	(135)
1. 天生一个不等式？	(135)
2. 回头是岸？	(145)
后 记	(151)

开放的中国还需要淑女吗？

1. 问题的提出

前不久，北京有一家杂志出了个题目让读者回答：开放的中国还需要淑女吗？这是一个概念十分含糊的问题。至少我们现在还不能准确地给出“淑女”的标准形象。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开放的中国是否需要“淑女”就无从谈起。

不过我想，人们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是无所谓的。我们不知道“淑女”的有无对开放的中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或怎样产生影响。事实上，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倒是根据下面的一些理由：在中国，人们终于意识到并开始谈论女性问题了。换句话说，中国的女性问题已经在90年代被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了出来。无论如何，寻找“淑女”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女性问题”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了。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件事引发了一系列跟女性问题有关的追问：“淑女”是一些怎样的女人？她们应该是一些怎样的女人？她们能够是一些怎样的女人？谁希望女人成为“淑

女’？是男性还是女性？为什么此时此地人们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这样提出问题？这个问题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现实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是近百年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吗？是中国女性在目前形势下新的权利要求吗？它和世界女权运动在现阶段的目标又有哪些差别呢？而且，“淑女”问题的提出，是否还包含了女性自新时期以来关于自身的主体性和性别角色的重新认识、重新评价、重新设计、重新创造的看法和思考呢？总而言之，从这件事我们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女性问题在中国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从本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一直试图使我们相信，在中国，妇女已经随着革命的胜利而获得了解放。因而，妇女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尽管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仅仅是社会发展水平制约下和旧观念影响下的局部现象。1994年发表的《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指出：

从本世纪上半叶起，广大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民族和自身的解放，经过几十年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占全世界妇女四分之一的中国妇女终于获得了历史性的解放。

新中国宣告了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她们和全体中国公民一样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中国的各种法律保障妇女与男子具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具有同等的人格和尊严。中国政府运用法律的、行政的和教育的手段消除对妇女的各种歧视，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今天，中国妇女已享有中国几千年来从未达到、许多发达

国家历时数百年方才得到承认的平等权利。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妇女曾被禁锢的聪明才智极大地释放出来。她们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地投身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成为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力量。她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在工农业生产、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中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半边天’成为全社会对妇女作用最形象的赞誉。

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国妇女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她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在参政能力、文化水平、科学知识、生产技能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①

这里所说，显然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新中国的建立，的确是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性过渡。在国家的支持下，中国妇女以崭新的姿态站立起来。她们被看作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她们和男人一起成了新中国的建设者。在很短的时间里，有数以亿计的被解放了的中国女性走出家门，投身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生产劳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能办到”，成为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毫无疑问，中国妇女在这样一个时代所获得的发展是空前的，她们依靠国家的帮助，不仅挣脱了传统父权、夫权的压迫和统治，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使之从传统角色的“家庭中人”变成了“社会中人”，即国家的人，从而引出了国家塑造妇女的

^① 《中国妇女的状况》，第1—2页。

新的解放历程。这时，我们在社会上几乎已经找不到没有女性参加的领域。而且，在许多方面，女性的成绩超过了男性，甚至使男性感受到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和挑战。一位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妇女，在一本关于中国女性的书中，谈到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妇女带来的影响，她说：“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正在发生的所有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①她在书中探讨了究竟是在什么力量的作用下使四分之一的人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支点就是地球运转的轴心——妇女的地位。土地改革时，妇女同男人平等地得到了她们的一块土地，使得男人所拥有的土地一分为二。接着妇女为成立合作社而放弃了她们的所有权，以换取有平等的一份报酬。”继续写下去，她还提到了“托儿所和公共食堂”，她说：这使得“妇女劳动力在中国一千年来第一次得到了解放”^②。

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新制度的特点就是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这种一体化带来的问题之一，就是有意牺牲了所有女性的标准和价值观。人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过去的高领、修长、两侧开衩的丝绸旗袍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从我们的视界中消失了，而代之以统一的蓝色制服。50年代采访过中国的很少几位外国记者中的一位以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推测：“这些为过冬而塞垫棉花的可憎的蓝色棉衣是因为需要而生产的东西——棉布短缺，需要大量生产，只是后来这种单调乏味本身，才变成意识形态上时髦的东西——但是它们使每个妇女成了鼓鼓囊囊、性别上毫无意义的肥胖

① [美] 梅伦·福斯特·斯诺编著：《中国新女性》，第1页。

② 《中国新女性》，第3-4页。

玩偶。”^①事实上还有比棉布短缺更重要的因素。1956年，中国妇联曾做出决定，试图要求有较为女性化的着装。但她们遭到了拒绝，女性们认为她们的革命立场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蓝色棉制服。蓝色制服成了女性革命的象征，人们从着装上很快就可以判断她们是不是新女性。在生活中，她们设法使自己完全等同于男性，而不是相反，坚持她们有权使自己成为女性。

很显然，这种伴随着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战争而突然实现的妇女解放，其结果是把许多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性别问题给遮闭了。作家王蒙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先前的看法：“妇女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阶级问题，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的成功，童养媳没有了，买卖婚姻没有了，‘姊姊妹妹站起来’（这是50年代一部反映取缔妓院的大型纪录片的片名）了，妇女有了与男人平等的公民权、财产继承权、教育权与就业权利了，女政治局委员女司机女飞行员女兵女警察都有了……至于女作家，她们比男作家还‘厉害’呢……我们还有什么妇女问题（除了边远农村）吗？”^②这里所反映的观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肯定，绝大多数的男性都持这样的看法。我们常常听到男性对女性说，你们现在太解放了，你们还想怎样？

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政府官员们几十年来一直宣扬一种观点，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相当片面的。把妇女解放置于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之中，这只是妇女解放的初级形式。这种形式的解放掩盖了妇

^① 《中国新女性》，第63页。

^② 王蒙：《说“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读书》1995/01/58。

女的阶级身份是从父亲、丈夫间接获得，妇女不仅受着社会其他阶级的压迫，还受着本阶级的男性的压制这一事实。在这种片面的思想观念和世俗偏见影响之下，女性只能被男性所规范、所定义，她们甚至被要求忘掉自己，把自己置于男性生活的阴影下，与男性同悲喜而共哀乐。她们没有自己的生活，她们被要求像男人那样生活，要求她们适应以男性为标准的社会结构，以至于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知识女性还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自己的性别。王蒙在同一篇文章中谈到他的一段经历：“一些年前，我与一些男女作家一起出国访问，我们的女作家被问及关于女性文学、女权主义等问题，我们的男女作家的脸上都出现了麻木、困惑、讥讽、无可奈何与不感兴趣的表情。没有一个女作家承认自己关注女权问题（似乎我们这里早已没有女权问题或者女权问题是一些低层次的不值得我们的优秀女作家去关心的问题），承认女作家与男作家有什么重要的不同，承认性别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更不要说是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了。”^①

一位文学研究专家也注意到了在女作家中普遍存在着的对于性别的忽略或轻视，她指出：“从 1949 年一直到‘文革’结束，囿于禁忌，妇女写妇女一直都不景气，女作家大都脱离了 20、30 年代文学女前辈的传统。这种状况与前苏联相仿，‘妇女总是心里怀着一种男性传统来创造女性形象’，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将性别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看待。”她还提到妇女作品受到的主题与题材等级的限制，认为多年来致力于妇女文学研究的女性文学批评家，也不得不按题材来为妇女文学的成就排队。她首先谈到

^① 《说“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读书》57/01/1995。

的是“那些反映重大社会矛盾的作品，因为它们毕竟是关系着千百万人的命运的”；稍逊一筹的是写“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触及人的尊严、人的命运”的作品，这第二类作品因“以小见大”的手法而得到肯定；她最后谈到的才是一些以爱情婚姻为主旨的作品，尽管这类作品不以女作家为限，但是“女作家的这类作品似乎更引人注目”。言外之意是：首先，爱情、婚姻跟妇女最密切相关；其次是，这一题材的位置最低。这位专家问道：“是什么构成了题材的重要性？男人和女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到底有什么区别？难道应当理所当然地认为：‘战争场面比商店的场景更重要？’——还得理所当然地假定，在战场上的是男人而在商店里的是女人。”^①

这种情况直到本世纪 90 年代初才有所改变。一些研究女性问题的学者开始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重新进行审视。她们提出：“妇女解放已经历了三种形式。”^②除了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到的表现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式的妇女解放之外，“第二种形式是社会权利解放，这是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妇女解放’。这一解放是社会民主意识增强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妇女获得了人权，主要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但这种解放仍掩盖了妇女在生理、心理、社会进化程度等方面与男子不同的事实，它不过是使妇女进入了原来由男性主导的社会”；“第三种形式是妇女自主追求自身的全面解放”^③。据说，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其特点是追求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认识的加强，强调妇女在心、

① 朱虹：《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病妇形象》，见《性别与中国》，第 270 页。

② 乐铎：《迟到的潮流》，第 1 页。

③ 《迟到的潮流》，第 2 页。

智、进化等多层面的与男性的不同，反抗依然广泛存在的男性本位意识，主张男女应当发扬各自的特质。

值得重视的是，这种被人称为“当代高度的解放形式”的妇女解放的新的目标，其中显然包含了对女性的重新认识、重新评价、重新设计和重新创造，包含了对于女性权利意识的思考与张扬。有人就曾指出，西方女权主义自本世纪初伴随各种现代思潮涌进中国以后，一直命运叵测。在“男女平等”的旗帜下，它曾与共产主义运动合流，但自始至终是后者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和诋毁的对象；它既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却又始终承受着民族主义情绪中对“西方”的抗拒。它是反男性中心社会的，然而却被男人接了过去，成为男人试图解放自己的武器。在这一点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西方女权运动形成了本质上不尽相同的历史内涵。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中国的妇女解放往往是由男性最先提出并付诸行动的。一百年前，领风气之先的中国男性为女性争取权利，其目的就是富民强国；一百年后，男人重提女性问题，或者说把女性变成问题，这本身就说明了女性在生活中的处境。似乎女性永远也逃不出男性话语所规定的范围。当然，无论是百年前还是百年后，我们都可以透过男性的声音，听到女性的倾诉和呐喊。

进入 90 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世纪之交的钟声的临近，女性问题似乎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在这里，有两个大的社会背景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一个是国内，在整体上出现了认同民族传统，重新肯定传统价值观念的怀旧式心理倾向和要求。这自然和 20 世纪末我们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现实环境有关。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个人控制的放松，也使得一些积极探索女性问题的人，有可能从深层文化意识的角度，把女

性的生存境遇充分揭示出来。另一个是国外，近几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激烈动荡，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在重新思考过去和未来的历史追求到底是什么？人性的本质和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曾经一度被我们遗弃和批判的人类文明遗产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是否还有意义？特别是，一个开始于本世纪初的改造人类的梦想竟然恰好在本世纪末终结，人们不得不这样想，作为这个梦想一部分的女性的解放，有没有给女性带来新的问题呢？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些女性和男性试图在理论上和以往的妇女解放及妇女权利意识划清界限，开始强调女性是“女”与“人”的统一，是人的存在与性别存在的统一，主张重新回到“女人”多样性的角色中去。对女性来说，这究竟是福是祸，是幸还是不幸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2. 男人说：淑女难寻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女性“女性化”的要求竟然是以男性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寻找“淑女”的方式提出来的。一个中国男人不无伤感地对一个西方女人说：“你在英语里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来翻译她，就像你在这块盛产淑女的土地上越来越难以发现她一样……淑女要儿女读书，使丈夫成为绅士，让社会弥漫着书香……每一个淑女云集的朝代，全中国都呈现出祥和……淑女纯净，在草坪和饭店之间，她一定选择草坪……她们是美好的女人，就像今天的阳光一样灿烂……”

这是中国男人做了四千年的一个白日梦。有人至今不醒，一定要继续做下去，至少说明了“淑女”对于男人还不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知道历史上是否曾经有过“淑女云集的朝